



野  
源

世界

十二

理 實 叢 刊 之 一  
張 鐵 生 等 著 譯  
新 中 出 版 社 刊 行

# 資本主義世界新形勢

---

理實叢刊之一

資本主義世界新形勢

版權所有

著譯者 張鐵生等

編者 沈志遠

出版期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

定價 港幣三元五角

刊行者

新中出版社

香港天后廟道金龍台三號

## 目 錄

|               |          |
|---------------|----------|
| 論羣衆路綫的思想鬥爭    | 邵荃麟(一)   |
| 論當前世界形勢中的主要矛盾 | 喬木(八)    |
| 杜魯門主義的經濟根源    | 思慕(三)    |
| 英國的經濟戰略論      | 沈志遠譯(五)  |
| 獨占資本在戰敗的德國    | 崔石蘊譯(四)  |
| 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     | 張鐵生譯(六)  |
| 論自由主義在中國      | 胡繩(七)    |
| 蘇維埃社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 | 王劍秋譯(〇)  |
| 莊子的身世及其思想的成因  | 侯外廬(九)   |
| 哲學的根本問題及根本派別  | 馬特(七)    |
| 馬克斯主義和現代經濟思想  | 胡仲持譯(一〇) |
| 編後記           | 編者(六)    |

# 論羣衆路線的思想鬥爭

邵荃麟

今年春季，上海文藝界發生了幾次劇烈的論爭。這些論爭雖然不會得到更好的發展，而日最後終於牽涉到人事的糾紛，使論爭漸漸離開了作品本身，而成為批評與被批評者之間的問題了，但無論如何這些論爭所產生的積極意義與作用，還是應被肯定的。由於這些論爭，終究廓清了一部分思想的混亂和阻止了某些不好的傾向，而另一方面也打破了過去互相緘默的太平氣象，發揚了文藝思想鬥爭上的民主精神。基本上我以為還是一種可喜的現象。

由於論爭而引起若干過火的現象，以及人事糾紛，自然是應該糾正的，因為這不僅是妨礙了團結，並且也妨礙了論爭。但是也不應把它過份誇大，更不能以息事寧人的態度去糾正。過份誇大和矯枉過正的結果，說不定又要回到「一團和氣」的局面裏去，那不是解決矛盾，而是隱藏矛盾，隱藏矛盾的結果，無疑只是醞釀着更大的矛盾罷了。

團結與批評的一致，思想鬥爭與統一戰綫的一致，在理論上大家都是承認了的，而在實踐上却又往往感到矛

盾。實際上這種矛盾是存在的，因為所謂一致乃是指導矛盾的統一，即是從思想的不一致到達思想的一致。在這過程中，必然要首先提出矛盾，然後才能克服矛盾。在批評或論爭中間，思想上對立狀態總是首先存在着，然後從思想的說服上去克服這對立的狀態。離開了思想鬥爭的原則，這種對立狀態固然可能引導到人事糾紛上去，而達不到一致的效果，而同樣，一看到對立狀態就神經過敏起來，生怕妨害團結，這也是離開了思想鬥爭的原則，將達不到一致的效果。二十餘年來新文藝運動，事實上，正如楊晦先生所說是在論戰的傳統上發展過來的。我們戰友中間就會經過無數次的對立，鬥爭，（甚至也不免有過人事糾紛）然而今天看來，這些鬥爭，對立，並沒有妨害我們的團結，反而是擴大和鞏固了我們的團結。這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但是從對立到一致的過程，却是複雜，曲折而不平衡的，這一點認識我以為很重要。我們常常有種性急的毛病，忽視了思想行列間一種自然的參差底狀態，要求什麼

人都在一條線上看齐，這是一種非辯證的觀點，因而不會得到一致的效果；而相反的，另一種毛病就是以爲只要大方向相同，其餘就不必過問。這也是對於「大同小異」原則的錯誤理解。所謂「大同不妨小異」是指統一戰綫中不應排除小異的存在，但並不是放棄了對小異的善意的思想鬥爭（這種鬥爭應該是一種幫助），否則便是只講團結不講批評，所謂大方向也變成了空洞沒有力量的東西了。「論文藝問題」一書中說得很好：「在這一問題上有團結，在另一問題上有鬥爭有批評。各個問題是分開而又聯繫的，因而就在產生團結的問題上，譬如抗日問題上，也就同時有鬥爭，有批評。在一個統一戰綫裏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只有鬥爭而無團結，而實行如過去某些同志所實行的右傾投降主義，尾巴主義，或「左傾」的排外主義宗派主義，都是列寧所謂跛了腳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藝術上也如此。」

目前被指摘的所謂「一團火氣」與「一團和氣」的現象，正是這種跛了腳的文藝政策底殘餘。

這種現象的產生，有人以爲是由缺乏較好的批評態度，但蔣天佐先生却指出並不是什麼態度問題，而是思想腳趾的問題。我完全同意蔣先生的說法。因爲態度激烈並不一定就是壞，態度溫和也不一定就是好。這裏還有一個敵友之分和傾向錯誤的程度之分。對於某些敵對的卑劣份

子，魯迅先生甚至主張費厄澆燬（Fei-fai-cho）都應該緩行。誠如蔣天佐先生所說，批評不是權術而是一種思想鬥爭。鬥爭的態度要決定於鬥爭的性質，而在批評者的本身，則是決定於對文藝工作與文藝運動的正確認識。

批評的目的是在明是非，這是無需說得的，但正如唐弢先生所說，「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將以什麼爲標準呢？即如唐弢先生所說「取其大而略其小」，但所謂「大」也仍然需要一個標準。這不是僅僅以大方向相同一句話所能解決，而必須在具體的社會實踐上去測驗。在批評者與被批評者的論爭中間，他們同時必然是面對着一個共同的對象，這就是他們的讀者，觀衆，和其他的社會羣衆。是非的標準我以爲是存在於這些羣衆中間的。在思想發展的歷史上，羣衆往往是最高的公正裁判者。好的作品能够經過歷史考驗而保留下來，而壞的作品則遲早遭受了無情的淘汰。這難道僅僅是批評家的功勞，而不是羣衆自己的取捨嗎？羣衆的意志在這裏也就成爲思想鬥爭與統一戰綫底矛盾的一致底契機。當批評工作作爲思想鬥爭的社會實踐來看的時候，我們就不容忽視它社會的效果。論文藝問題的作者指出批評工作必須從社會的效果上去檢查作者的主觀動機，正是這個道理。

我們都有發表我們思想的自由，創作的自由和批評的自由，但是這些工作我們却不能不向我們的共同對象——

讀者，觀衆和其他社會羣衆負起責任。我們的創作並不僅僅爲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當書籍印行出來，戲劇表演出來，它已經成爲一種社會行爲，這中間就必然包含了教育的意義，也必然產生一定思想與道德上的社會效果。對於這些效果的利害責任，作者是應斷然承負的。同樣，一個批評家在報紙或刊物上發表了他的批評，它已經不僅是單純對於被批評者的一種個人關係，而成爲一種社會行爲和產生一定的社會效果了。批評的目的固然是爲糾正創作者的某一種不正確的傾向，但更主要的，却是爲了糾正這種傾向在羣衆中可能發生的錯誤影響。這裏自然也就包含着教育羣衆的意義和對於羣衆的責任。但是無論創作家和批評家，一方面固然是爲了教育羣衆，而同時也是被羣衆所教育着，創作家是從羣衆生活的認識中間，汲取其思想與感情，去從事創作，而批評家則從羣衆意見的反映中間去檢查一個作品的社會效果，因而提出了他的批評。無論創作家和批評家決不能自以爲高高在羣衆之上的什麼「優越之羣」，而必須同時是人民大眾恭敬的小學生。因此羣衆不僅是作家與批評家所應共同負責的對象，而且也是他學習與獲得其認識的共同對象。在這個共同的老師之前，共同負責的對象之前，他們的是非之爭，爲什麼不能獲得一個統一的標準呢？創作家發表他的作品，如果能多考慮到他的作品對於羣衆所負的責任，自然不敢粗製濫造或以作

品騙取稿費，而對於別人的批評也就不能不當作是社會意見的反映而首先對自己的責任，有所檢查。批評家如果具有這種羣衆的責任感，則自然不得不注意他說話的對象，因而也就不敢亂捧亂罵，不敢把思想的論爭化爲個人的意氣。羣衆所要求的，乃是真實的思想，而不是爭吵的喧聲；人事糾紛在文壇上也許有人作爲津津有味的话柄，但在社會羣衆中却是索然乏味的最可厭的喧囂。批評變成了人事糾紛，早已經脫開了讀者對象，而成爲個人之間的爭吵了。

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要從個人感覺的小圈子中掙脫出來，成爲一種嚴肅的社會事業。這就不能不要求作家和批評家具有爲羣衆的觀點，和具有對羣衆的責任感。這其實並不是過高的要求，只是作爲一個真誠的藝術家所應有的藝術道德。在托爾斯泰的藝術論中間就有了這樣的要求。但是必須區別的就是我們所說的羣衆觀點，首先是出發於肯定羣衆的偉大力量與正確意識，而不是出發於托爾斯泰那樣的人道主義。這種肯定也不是由於教條式的承認，而是通過實踐的感覺與認識。遭受了封建勢力與帝國主義長期迫害磨折的中國勞苦大眾，他們的靈魂裏潛藏着比其他階層更強烈的愛與憎，具有比其他階層更分明的是非判別力，這些形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一種堅強的意識力量，特別在每次生存鬥爭中間，這種意識力量顯示得最爲分明。

文藝家感受了這種力量，體驗了這種力量，通過藝術的概括把它表現出來，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藝術力或思想力。而從這裏，我們也就明白所謂藝術力或思想力的來源既然是社會羣衆的力量，那末羣衆的力量自然也就是統一思想鬥爭和擴大與鞏固統一戰綫的主要力量了。

忽視了這種力量，或是對羣衆的不信任，這就是構成缺乏對羣衆責任感底根源。例如近來被指摘的戲劇上與小說上迎合的傾向，我以為即由於這種原因，智識分子最易犯的毛病，即喜歡以自己的生活觀念與藝術興味去衡量羣衆，因此往往只看到他們落後的一面，便產生輕視他們的心理。某些人有時確實也謳歌羣衆，但是那只是腦子裏一種抽象的羣衆，或是在周圍現實生活以外一種幻想的英雄羣衆，而對於眼前所接觸的實際人民，却覺得是庸俗、愚昧、醜陋而可笑的。於是在理論上讚美人民，而實踐上却輕視羣衆，一面在歌頌人民的偉大，一面又在感嘆世界的寂寞或責備觀衆與讀者的低能與落後。這種矛盾的現象，在我們中間怕不算希罕罷？而在這種矛盾虛偽的觀念之下，對羣衆的強烈責任感當然就不易產生了。

爲使我們的文藝創作和批評工作獲得更健全的發展，我以為強調文藝思想鬥爭上的羣衆路綫是有必要的。事實上，歷史上的文化思想都是客觀地受着羣衆路綫所支配的。康有爲、梁啟超、胡適、周作人都倒下去了，而魯

迅、李守常、蔡元培、瞿秋白則永遠屹立着。這清楚地說明凡是違反羣衆利益，不能對羣衆負責，不信任羣衆力量的，就一定被歷史所淘汰，這是一種歷史客觀的法則，而我們現在就應該把這個客觀的法則作爲我們主觀的創作與批評的路綫。自然這並不是說，拿一個抽象的羣衆意識，作爲死板的教條來衡量一切。我們所說的羣衆，是一定時空條件下實際存在於我們周圍的羣衆，有他們具體的要求和認識。在一定歷史階段上，他們有一定的基本共同要求，而同時由於他們地區，生活性質的不同，他們的覺悟和認識上又有程度上的差別。其次，我們也還須承認，作家與批評家本身同時也就是羣衆的一份子，因此在他們的覺悟與認識程度上也一定有某些差別。拿一條固定的標尺去衡量一切人是要不得的，只有從社會實踐中間從現實的複雜狀態中間，去認識羣衆的具體需要，理解他們接受的程度，把握他們進步向上的意識，這樣纔能使所謂文藝上的羣衆路綫不成爲空洞的概念而是有它具體的內容。而在這羣衆路綫之上，所謂「明是非」「分敵友」「識愛憎」「慎褒貶」以至「衡輕重」，「爭緩急」，「別錯綜」，「權利害」纔有它明確的標準，而不至以這些原則去作爲掩護某些不應有的寬容或攻擊的飾詞。

從羣衆路綫的觀點上出發，我們首先應該批判的，自然就是那種「一團和氣」的傾向，或者「爲了運動，對於

某些作家要「姑且」不加批評」的庸俗論調，以及那種亂捧亂罵的不負責的態度。因為這一切對於羣衆是毫無好處，而對於作家，更是有害無益的。對於羣衆來說，這是一種責任的逃避。一件作品的惡劣影響已經在羣衆中產生了，批評家有什麼理由能够袖手旁觀呢？如果說，這是爲了運動的緣故，那末所謂運動又是什麼意義呢？我們中間似乎流行着這樣一種觀念，以爲文藝運動是一回事，思想工作又是一回事，某些人是從事思想工作，某些人是專門搞運動的，「爲了運動而姑且不批評」的論調，我想大概就是由於這樣觀念產生出來的罷。其實文藝運動就是一種思想運動，而且是羣衆的思想運動。我們並不否認個人與文藝運動的關係，但這種關係仍然是建築在思想與羣衆利益之上的。另一種錯誤觀念，就是把批評和罵人混淆起來。批評家說：「這非罵不可，」創作家說：「某人在罵我了，」於是害得搞運動的人戰戰兢兢，生怕惹出禍來。這些都是失却了對羣衆負責的態度。對於作家來說，這種批評的姑息態度，往往足以造成他的自誇自滿，或甚至碰不得的嬌態；如作家犯了一種不好的傾向，則這種傾向將因此而更發展下去。以私人的情誼代替了羣衆的思想鬥爭，這是最危險的文藝運動作法。從這種關係上，也就產生了所謂「全面肯定的要求」，蔣天佐先生說，「或多或少類乎這樣的要求，助長了那種世故的庸俗論調，而那種

論調又助長了這種要求。這互相因果糾纏在一起的一套思想意識，是批評工作的一大障礙。」這是非常痛切的論評，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謂「捧殺」。近年以來文藝思想上的混亂，散漫狀態，我以爲這種觀念和傾向多少是應該負點責任的。

和這一種傾向相反，或者也可以說由於不滿於這種傾向而產生的另一種傾向，即是所謂清高主義的潔癖傾向，也同樣是脫離了羣衆路線的。有人說「潔癖是人類最高貴的德性之一」，我想這大概是對於潔癖這名詞的誤會。潔自然是好的，堅持真理的立場，不同流合污，這些都應該是戰鬥者和藝術工作者的德性，但潔而成癖，這就變爲個人的清高主義了。個人清高對於個人或未可厚非，但對於羣衆，却是沒有益處。羣衆不是劃一的，有進步的，有中間的，也有落後的，而且由於封建文化傳統歷史的悠久，中間與落後的往往居多，因此照顧多數中間落後的羣衆，在思想啓蒙工作上是有必要的。照顧落後和向落後看齊是截然有別的，這和迎合與爭取截然有別是一樣的。但如果孤芳自賞，或根本蔑視羣衆或戰友中間的落後狀態，把它們看成不值一顧，這就脫離了羣衆路線。這一種潔癖傾向，表面上看來似乎是種個人的堅強，實際上却是一種脆弱，因爲脆弱，便生怕自己會被沾污，於是便遠遠躲開，或首先對那羣衆中落後狀態取着敵對的態度。出發點或許是知

識分子對藝術的忠實，結果却變成對於羣衆責任的逃避。醫生是要求人人健康的，但爲了達到這一目的，他就不得不先去接近膿臭，和以至大的耐心去幹排膿除污的工作。醫生有責任勸告羣衆避開傳染病者，但他自己却不能逃避接觸症人的責任。如果看見病人的病狀，首先皺眉蹙額，掩鼻而走，這就不成其爲醫生了。文藝批評工作者也應該有同樣的精神與態度，自然這只是對於羣衆和戰友來說，至於對付羣衆的敵人，則只有像魯迅先生那樣反戈一擊，制其死命，絕沒有寬容的餘地的。

統一戰綫自然絕不能是「同流合污」，但是在共同方向下，容納某一些思想上的參差却是應該的。這就是上面說過，首先肯定矛盾存在從而去克服矛盾。有堅強自信力與意志的人是不害怕矛盾的。一個好的將領是要求他的戰士個個都是精兵，但要個個都是精兵然後纔能作戰的，却決不是好的將領。潔癖傾向者就是此種將領或者前一種掩鼻而走的醫生。

不過這裏所說「潔癖」，還是指自己保持正確的藝術認識，而不願去克服羣衆某些落後狀態的清高態度，至於另一種所謂「潔癖」，根本以小有產者的意識感情，作爲聖潔的東西，而把人民大眾的東西看作污穢骯髒，遠遠站開，那就根本是離開人民也離開藝術的一種傾向，豈但「潔癖」成了問題，連他的「潔」也是所謂「欲潔必未

潔」了。

而在這裏也就接觸到所謂共同方向的問題。所謂共同方向，是根據於一定歷史階段中革命實踐的要求，或者說，是根據於這階段中大多數人民的基本要求而產生的一種戰爭方向。一種思想運動有它的終極目標，而爲要達到這終極目標，它非得根據現實形勢的要求去確定當前的戰鬥綱領。例如目前中國的新民主主義思想運動就是作爲一種更高的思想運動在現階段歷史中的具體內容，而它也就同時作現階段社會思想鬥爭的共同方向。它既然是根據於人民羣衆的基本要求而確立，所以這種方向的運動，也必然是一種羣衆路綫的運動。爲追求某一種思想的終極目標，需要團結與爭取這一種思想的信仰者，而爲擊敗當前共同的敵人擴大思想運動的影響，又需要團結與爭取友軍。這是統一戰綫很簡單的道理。但我們也常常會陷於兩種偏向。或是只看到當前的共同方向，而忽略了自己所追求的終極目標，結果喪失了自己的獨立性，漸漸變成了羣衆的尾巴，或則是執着於其追求的終極目標而忽略其當前的共同戰鬥要求，結果脫離了羣衆也脫離了戰鬥。近一二十年來我們思想運動上這種教訓是值得我們深深反省的。

中國社會所表現的那種兩端小中間大，兩端硬中間軟的特點，使思想運動上的統一戰綫更具有重要的意義，而也因爲這個特點，統一戰綫的內容也就顯得更爲複雜。稍

# 我們祖國的叢書

本叢書之目的，在將本國之歷史，地理，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國際等各部门的具體問題，簡明地介紹給海外僑胞及一般青年，故文字力求淺顯通俗，簡明生動，使他們讀了這套叢書，對於祖國的各方面現狀，得到一個明確的認識而加強他們對祖國的熱愛。

我們的祖國概說  
近百年來的地理形勢  
祖國抗戰八年聯合政府  
民主與獨裁的國策  
崩潰中的國民經濟  
多災多難的祖國文化  
殖民地的教育危機

論和平建國綱領  
憲政和憲法  
什麼是國民大會  
政治協商會  
解放區概況  
祖國的東北工業  
祖國的農業經濟  
中美關係  
中蘇關係

編譯委員

沈仲持 志遠 黃藥眠 千家駒 沙沫 廖沫沙

新中國出版社刊行

稍把握不住就可能陷於上述兩種傾向。在共同方向之下，不僅應該勇敢承認一種思想與其友軍之間某些矛盾是存在着，而且還應該承認自己之間，某些矛盾存在着，甚至在個人自身中間這些矛盾也存在着。這是由於小有產者的意識曾經在我們思想界中間佔過一時的優勢，這種意識與勞動人民大眾的意識的矛盾，成為在發展中的進步思想運動底一個重要的特點。我們應該正視這些矛盾，但不應該過份誇張這些矛盾。躲避矛盾是責任的逃避，誇張矛盾却是混淆了敵友的陣綫，把思想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狀態誇大為敵對關係，這同樣是逃避了羣衆的責任。掩蓋一切與抹煞一切，我以為都不是真實的戰鬥態度。真實的戰鬥態度

## 第一輯

應該是向羣衆毅然負起責任，把羣衆的愛憎代替了個人的愛憎，把羣衆的取捨作為自己的取捨，照顧落後的羣衆，同時幫助他們克服其矛盾。在羣衆鬥爭利益的前提下，我們絕不會因思想行列間的某些參差狀態，而懷疑到共同方向，反而從共同方向的確定而使敵友之分有明確的標準。

思想運動是通過羣衆運動的實踐而發展着，統一戰綫中間的思想鬥爭應該是羣衆運動實踐中間的批判與自我批判。這種批判與自我批判以及思想與實踐的結合，即是思想的真實運動，從這樣的運動中間，纔能取得思想統一戰綫的鞏固與強大，和保證革命思想的堅強性。

# 論當前世界形勢中的主要矛盾

喬 木

四月五日「世界知識」登了梁純夫先生的一篇「從莫斯科看美蘇關係」文章，裏面接觸到許多問題。

五月三日的同一刊物發表了該刊讀者陳正明先生的來信和梁純夫先生答陳正明先生的一封信。在這兩封信中，「從莫斯科看美蘇關係」一文所接觸到的問題被進一步地討論了。

五月十五日上海文匯報新聞窗欄發表了讀者李真先生的來函，提出了基本上相同的問題。該欄編者在同一天作了一個答復，我們不知道該刊編者是誰，但新聞窗編者答李真先生的信和梁純夫先生答陳正明先生的信在基本觀念上是一致的。

從以上幾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廣大讀者對於國際情況的關心是密切的，提出的問題是主要的。儘管問題的提法並不是完全確當的，但在編者的答信中，無疑問某種程度的混亂是存在的，而這種混亂對於廣大的要求了解當前國際局勢的讀者是有害的。自然，這不是說編者的主觀立場發生了問題，應該明確地指出編者是一心一意想從一個正

確的出發點替讀者澄清這個問題的，而混亂之所以產生却不在於出發點的錯誤，而是在於無形中運用了一些不清不白的範疇（這些範疇是帝國主義宣傳家所經常向我們腦袋裏灌輸的），結果就構成了錯誤。

總括起來說，讀者提出來的是些什麼問題呢？讀者的問題很簡單，他們要知道美蘇之間的矛盾和英美之間的矛盾在今天的國際形勢中，究竟那一個是主要的？

作者和編者所接觸到的又是些什麼問題呢？

第一，所謂美蘇矛盾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第二，究竟什麼是今天世界形勢中最主要的矛盾？

第三，世界形勢發展的前途又究竟會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不打算逐字逐句地指出那一篇文章和那兩封回信中的混亂，我們僅根據上述三大問題作若干基本的論列。

## 一、所謂美蘇矛盾究竟是個什麼東西？

到處都聽說「美蘇矛盾」，我們應當想一想，究竟

『美蘇矛盾』所包含的意思是什麼呢？從常識說來，美國是一個國家，而且是一個強國，她對於世界上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一定的意見的。蘇聯是一個國家，而且也是一個強國，她對全世界所發生的任何一件事情也是有她一定的意見的。假如說，因為她們對於全世界任何一個事件的意見不同，從而就說那一個事件是表現了美蘇的矛盾，那末可以說美蘇矛盾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的。除去直接有關美蘇兩國的事件而外，在理論上資本主義世界的大事可以分成三種類型。

#### 一、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糾紛。

#### 二、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糾紛。

#### 三、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糾紛。

在這裏除掉第一項糾紛，在原則上蘇聯不必採取任何立場而外，在其他糾紛上，美蘇皆各有其明確立場的。例如美國要把菲律賓變成殖民地，而蘇聯却對於菲律賓人民的民族運動寄予同情；但是，我們能說菲律賓獨立運動就是美蘇矛盾的表現嗎？很顯然是不能這樣說的。

嚴格說來，一般流行的所謂美蘇矛盾事實上是包含了以下幾種極其複雜的內容：

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兩種制度間的矛盾。

二、舊的資本主義國家和新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之間的

實際政治經濟上的矛盾。

三、處理美蘇共同敵人德日法西斯殘餘兩種不同方案的（保存法西斯與消滅法西斯的）矛盾。

四、橫貫於蘇聯以外的全世界的民主與反民主的矛盾。

這四種矛盾相互之間是有着各自不同的一定程度的聯繫的，但是把這種聯繫推進一步叫做密切聯繫，再推進一步變成美蘇矛盾的表現，那就大錯而特錯了。帝國主義宣傳家戰後宣傳方針，就是把他們反對新民主主義國家保存法西斯殘餘和廣泛的反對民族獨立與民主自由的運動一股腦兒叫成反蘇。我們跟着他們走，就等於取消了我們思想上的獨立性，變成他們的俘虜。敵人的目的要我們把這四樣東西混淆起來，我們的回答却正是應該把這四個系列的矛盾嚴格分辨清楚。從這一個觀點上說，可以稱為美蘇矛盾的，在原則上祇能指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兩種制度上的矛盾。而最不可想的是把實際上主要地存在於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民主和反民主的矛盾也說成是美蘇制度間的矛盾，不管是把前者當做本質把後者當做現象也好，或者是把後者當做本質把前者當做現象也好。這不是很清楚嗎？美國新國會的反勞工的法案顯然是從大獨佔資本家利益出發的，難道我們能說這一個關係重大的民主和反民主的鬥爭是美蘇矛盾的表現，或者說它就是美蘇矛盾的內容嗎？

我們要問一問，究竟爲什麼美帝國主義宣傳家的宣傳能起這樣大的作用呢？客觀上它的原因又何在呢？

從這裏我們就提到了美蘇對於東歐新民主國家和德日法西斯殘餘這兩大問題上的矛盾。由於美蘇對於這兩大問題，在戰後國際會議上一直處於針鋒相對的地位，人們就引起一種錯覺，以爲美蘇在兩大問題上的矛盾實際上也就是兩種制度的矛盾。但錯覺終是錯覺。儘管蘇聯是維護東歐新民主國家和力主消滅德日法西斯殘餘的，但東歐新民主國家的社會制度還決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儘管方向是向着社會主義的）而蘇聯所主張已經部份實行的處置德日問題的方策，也決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方策。而美國之所以反對東歐新民主國家也不是因爲它們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它之所以反對蘇聯處置德日的方策，也不是因爲那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方策。這樣，問題就很清楚了。儘管美蘇之間在這兩大問題上的矛盾是現實而且迫切的，但這矛盾的具體內容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上的矛盾，而是民主和反民主的矛盾。一個民主與反民主的矛盾不能不由美蘇兩國的對立而表現出來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殊構成和結局所造成的，但這並不能改變這個矛盾之爲民主與反民主的性質，這是一；其次，這種情況，就是說由美蘇兩國來代表矛盾的兩方在程序上是暫時的。五國和約完成，我們即不能再在任何一个意義上說美國對於東歐

新民主國家的矛盾是一種美蘇之間的矛盾了。因爲它在東南歐所反對的首先而且主要的是東南歐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是什麼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一旦德日和約告成，美國對德日兩國的政策也就將表裏一致地表現爲反對德國和日本人民的民主要求，而不是反對什麼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了。

在以上所論列的兩大問題上，今天世界形勢的特點是代表資本主義的美國連資本主義歷史範疇內的民主運動都無力正視，而德日真正民主化的方針（這也是資本主義範疇內的）却不能不由一個社會主義的蘇聯來提出，這並不說明蘇聯所主張的不管是什麼都是社會主義的，而是說明資本主義已經沒落到一個程度，連它們自己曾經做過的一些進步的歷史要求都已拋棄了。這不是蘇聯的擴張，而是美國的倒退。

這樣，總括以上我們對於四大系列矛盾的論列，可以得出這麼一個結論：嚴格的美蘇矛盾的涵義祇能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制度上的矛盾，這矛盾在現在和過去一樣，是世界形勢中基本的矛盾，但不是現實的和迫切的矛盾。其次，在解決戰後的重大問題上，在會議席上，美蘇矛盾是存在着的，但那矛盾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矛盾，而是民主和反民主的矛盾。就今天的表現形式而言，這矛盾是表現在美蘇之間，但就實質而言，這矛盾

却不能說是代表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的美蘇矛盾。最後，廣泛的民主與反民主的矛盾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說是美蘇矛盾。就今天民主運動所提出的實際口號而言，社會主義祇是被當成一種遠景，還沒有作為民主運動的一個實際口號提上議事日程。而相反的，美帝國主義的反民主方針却是圍繞着全世界所有封建的、落後的、法西斯的、反動的力量而進行的。因此，民主運動的陣營是廣泛的，包含了一切民族獨立和民主進步的反封建、反法西斯的和反獨佔資本的民主力量，它的綱領在基本上是屬於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範疇的。有錢的大資產階級逃出這個陣綫，並不否定了他的資產階級性質，各地的共產黨人熱烈地參加甚至於領導了這個陣綫，並不肯定了它的社會主義性質。

說明了所謂美蘇矛盾的真實含義，我們來談一談民主運動和蘇聯的關係。美帝國主義者要把所有的民主運動和蘇聯同一化起來，他們認為所有的民主運動都是莫斯科發跡指使的；儘管這一意見已經被有力地揭穿了，但還有許多人在客觀上上他的當。但另一方面，為了強調民主運動和蘇聯之間的差別，於是又產生了一種近於極端的見解，認為民主運動的成敗和蘇聯是沒有多大關係的，因此就得出結論說：美帝國主義的政策祇是反民主、反人民和反民族的，反蘇祇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幌子，這種意見也是不妥的，它和反蘇在今天沒有重要關聯，在將來也不會有任何

關聯。

符合於事實的說法是這樣的：首先，蘇聯對於民主運動的展開是關心的、同情的，但這種關係和美國對於反民主運動的關係却是截然不同的。美國在戰爭結束以後送了二百七十萬萬美金給全世界的反民主份子，但誰能指出蘇聯曾經給過二十七個盧布給任何一地的民主運動嗎？在這裏，美蘇各自對於民主和反民主兩方面的關係的差別是必須嚴格區分的。蘇聯對於民主運動的同情是依靠它的政治影響去表現的，而美國對於反民主運動的支持却是依靠實際干涉去進行的。蘇聯是民主運動嚴格意義上的燈塔，而美國却是反動力量的實實在在的堡壘。任何一個國家不會放棄自己的政治影響，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權利去干涉另外一個國家的內政。假如有人把民主和反民主的矛盾等同於美蘇矛盾，就等於把自然而然的政治影響等同於人為強制的干涉內政。因此，儘管說蘇聯對於民主運動是同情和關心的，但這種關心和同情是道義的而非實際政治的，這是一。其次，就民主和反民主這一鬥爭的成敗而言，蘇聯，作為一個國家自然希望民主運動在全世界各地能够成功，因為這種成功在客觀上將大大地加強了它的地位；但這不是說美國領導的反民主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打擊蘇聯。例如，美國最近援助希土的反動政府儘管口頭上說是為了對付蘇聯，但實際上主要的却是為了中東的石油，打

擊的對象首先和主要是希土兩國的人民。但從另一方面說，希土法案也不能說完全和反蘇的陰謀無關，但這種關聯在今天是要的，而重要的是：從世界人民的立場而論，不是這反蘇目的的有無，而是這一目的在這全盤策略中佔據什麼樣的地位。

民主和反民主的矛盾是和美蘇矛盾制度有着關聯的，但那關聯的特點，却要嚴格加以區分的。

## 二、究竟什麼是今天世界形勢中最主要的矛盾？

一般的讀者往往會問，英美矛盾和美蘇矛盾究竟是哪一個大些？現在，我們應該想一想，讀者們這樣問究竟是什麼意思呢？這祇可能有兩層意思：

第一，讀者們要急於知道，在全世界的各種重大矛盾中，究竟什麼是最主要的矛盾？第二，更深一層，他們要了解，究竟是資本主義底矛盾超過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呢，還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已超過了資本主義內部底矛盾？假如說資本主義底矛盾超過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那就是意味着，資本主義本身的問題很多，在客觀上構成了有利於社會主義國家和平發展的條件。假如說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超過了資本主義底矛盾，那就是意味着，資本主義本身的

問題很少，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就有日漸發展，從而構成了對於社會主義國家一種嚴重威脅的可能。從這兩層意思去看，很顯然讀者的問題應該是，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和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矛盾在現階段中究竟是那一個大些？這才是問題的正確的提法，但是為什麼讀者却又拿英美矛盾來代表資本主義本身的全部矛盾呢？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提法。我們的課題不僅在於指出這種提法之錯誤，而且要指出這一個錯誤的根源。

大家都知道，把在帝國主義時的資本主義底矛盾劃分為三類是列寧在他的「帝國主義論」裏首先提出來的。根據斯大林在他的一九二四年發表的「論列寧主義底基礎」一篇演講辭裏，第一次他是把資本主義底三大矛盾這樣來排列的：

第一個矛盾就是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不用解釋，這是資本主義底最基本的矛盾。

第二個矛盾就是各財政集團與帝國列強間為爭奪別國領土而發生的矛盾。簡單地說，即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這無疑問在當時是資本主義底最現實的矛盾。

第三個矛盾就是為數極少的統治的「文明」民族，與世界上十多萬萬殖民地與附屬國人民間的矛盾。關於這一矛盾，用斯大林自己的話來說，「這個情況（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獨立解放運動）對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為這個

情況根本地破壞了資本主義的障地。把殖民地及附庸國從資本主義的後備力量變爲「宗主國」無產階級的後備力量。」（『列寧主義問題』一九四六年莫斯科版第二十二頁）

在同一篇演辭中，作爲無產階級革命論的出發點，斯大林又把這三個矛盾重新排列過一次。在這一次的排列中，他是按這樣的順序來列舉的：

第一是勞資間的矛盾。從這裏得出了無產階級革命論的第一個結論：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宗主國」內部的無產階級的暴發因素日益增長。

第二個矛盾，帝國主義「宗主國」與殖民地及附庸國的矛盾。又從這裏得出了第二個結論：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危機日益尖銳化，國外及殖民地的反帝國主義情緒日益增長。

第三個矛盾，是帝國主義列強間的矛盾，由此就得出第三個結論：在帝國主義下，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戰綫與世界殖民地革命戰綫必然聯合成爲一個世界革命戰綫來反對一個世界帝國主義戰綫。（同書第三十九頁）

無論是在那一種排列程序中，可以看出：列寧根據了資本主義發展不均衡的原則，相當地強調了資本主義三大矛盾中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這一矛盾，這是完全正確的。

兩次世界戰爭的爆發都證明了列寧底天才的預見。但是正因爲如此，在一般羣衆間就產生了一種趨勢，往往在有意和無意中把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看成了資本主義矛盾的全部，這是可以解釋的，因爲從蘇聯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帝國主義宗主國內部的勞資矛盾，並未能勝利的展開，而另一方面，儘管殖民地和附庸國的革命鬥爭在兩次大戰間有了空前的發展，但是也還沒有能够徹底地震撼了帝國主義統治的全部。這樣，一談起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人們即很自然地首先想到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因爲那是最現實的矛盾；而往往忽略了，或者不够重視另外的兩種矛盾，儘管那另外兩種矛盾是更其基本的。但是，經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情況發生了基本的變化。我們不能在這裏深入地分析這些基本的變化，但在這些基本變化中，爲了說明我們目前的論點，以下的幾個變化是必須指出的。

第一，由於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結束，過去和英美帝國主義分庭抗禮的帝國主義國家德國和日本從世界舞台和世界市場上暫時地退出了。

第二，還沒有退出世界舞台和世界市場的英國，也遭逢了嚴重的削弱。這並不是說，英國在將來再不會重振旗鼓。但是，在戰後的這一過渡期中，它在世界舞台和世界市場上的地位暫時地受到了挫折。

第三，在第二次世界戰爭期中，美帝國主義的生產力增加了一倍以上，這就使得美帝國主義的生產力提高到了佔資本主義世界總生產力三分之二的空前未有的高度，這樣就使得美帝國主義不僅變成了資本主義世界決定力量之一，而且變成了資本主義世界唯一的決定力量。

總結上述三大變化，可以說，經過了第二次大戰的變化，帝國主義間的關係是暫時地比較單純化了。但這只是圖畫的一面。圖畫的另一面是：

第四個變化，由於第二次大戰的特殊構成（蘇聯的參加，戰爭並未降臨美國本土而美國却作為這個戰爭的兵工廠，和全面的勝利，）及其反法西斯的特質，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的矛盾起了一個深刻的變化，這變化用最通俗的語言來說，在經濟上可以說是，世界太窮（窮到發生生產不足的恐慌），美國太富（富到醞釀生產過剩的危機）；美國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的經濟懸殊加強了。從政治方面說，世界向左（左到不怕社會主義），美國向右（右到走向法西斯）；這就是說美國和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世界之間政治上的矛盾是更加尖銳了。總括這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變化，我們應該這樣說，作為一種超級帝國主義的美國，它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國，半附屬國，半獨立國，甚至獨立國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尖銳化了。這就暫時地構成了一種新的形勢。用列寧的資本主義矛盾三

分法來說，帝國主義國家間矛盾的比重暫時地單純了，除了美國以外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反動政府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加強了；新興的超級帝國主義的美國和它的帝國主義政策對象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半附屬國，半獨立國，獨立國——以及所有這些國家中的廣大人民間的矛盾更增加了。這就使得美帝國主義和廣大的世界人民的矛盾在現階段中形成了資本主義世界中主要和決定的矛盾。這是一個新的形勢。在此新形勢下，我們更不可能用英美矛盾來概括資本主義內部的所有矛盾。

爲了進一步了解這一新形勢下的特徵：

首先必須指出的，美帝國主義由於生產能力的絕對優越性，它並不需要取得一種舊式殖民地國家的那種特殊地位，才能進行其帝國主義的剝削和奴役。過去舊式的帝國主義的建立之所以必須取得形式上殖民地的特殊地位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力的優勢還不是絕對的，所以它需要保護；另一方面，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不僅是需要以特殊地位來保護它生產技能所不能取得的地位；而且還因為在當時的世界舞台上，還存在着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爲了防衛那些另一批帝國主義國家，它必須取得殖民地的特權地位，來保衛其既得的利益。但是，美國由於它在生產力上的絕對優勢，和它在資本主義世界的決定地位，這一套老辦法對於它是不適用的。美帝